

新世纪挑战 与 民族教育的使命

——《中国民族教育发展途径探讨》引论

陈 红 涛

西南民族学院《民族教育》编辑部

1989年12月

一，新世纪的挑战

星移斗转，21世纪只有一步之遥。放眼迎面而来崭新世纪，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形成了一种共识：亚太，这个年轻而蓬勃发展的地区，正在崛起；“欧洲中心主义，行将完结”，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未来世界的重心，即将转向亚太地区。21世纪，将是“亚太世纪”！

亚太，拥有全球陆地面积的1/3，海洋总面积的1/2，和全球1/2的人口。回首40年前，亚洲还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地区，人均国民收入还不及当时的黑非洲（118美元）。从6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开始突起。苏联工业中心战略东移，从欧洲部分移往亚洲部分，加强了对西北利亚和远东的大规模开发。美国全国经济布局西移，由东北部旧工业区向西南部大转移，“阳光地带”即美国西南部太平洋沿岸地带“朝阳工业”勃兴。日本立足亚太，争雄世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把握国际环境变化调整战略，发展外向型经济，很快昂首腾飞。东盟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四国，也扬鞭奔向工业化大道……，这一支支进军曲，汇成迎接“亚太世纪”的交响乐。

面对新世纪的挑战，欧洲，被誉为“人类现代文明的摇篮”的欧洲，产生过马克思主义的欧洲，能甘心移位吗？在以往的300余年中（从16世纪中叶～20世纪20年代），世界

科技中心一直在西欧的意大利、英、法、德几大强国中传移，人类第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主要成果都出自欧洲大陆；同时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也在欧洲。3个多世纪来，欧洲一直主宰着世界发展的基本格局。如今，面对亚太崛起的新态势，由法国承头、由欧洲17国的34位外长和科研部长共同制订了“尤里卡”计划。西欧宣称：新世纪的战略资源是科学技术，21世纪里，决定国家政治地位的，不再是国家疆域大小，人口多少，核武器多寡，而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表面看，“尤里卡”（原意为“我发现了”）计划，是西欧高科技联合开发计划，实质上是一个通过科技联合——经济联合——政治联合而重振西欧雄风的战略计划。正如欧报所评：尤里卡“是正在发生变化的欧洲政治家觉悟的表达”，“是欧洲自主意识的表达”，“是欧洲‘旧大陆’生存能力的证明”。于是，他们开始起用“欧洲统一护照”（1985年元旦起）、“欧洲统一汽车驾驶执照”（1986年元旦起），高举起“欧洲共同体旗帜”，高唱“欧洲共同体颂歌”——贝多芬第2交响乐《欢乐颂》前奏曲，雄心勃勃地奔向21世纪。

面对此，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我们中国——居于亚洲大陆东部、太平洋地区中心位置的泱泱大国，能无动于衷吗？我们理当抓住良机，在10年改革的基础上，豪迈地擂响向现代化进军的战鼓，挥动振兴中华的千军万马，从而使“亚太世纪”的交响乐更加雄浑。

二、严峻的现实与民族教育的使命

机遇千载难逢，现实却很严峻。

中国是一个东西部明显悬殊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而这

种社会经济结构，又是长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千百年来，在中华民族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生存空间里，东部湿润地区，平原丘陵列布，河川交错，适宜农耕，以汉族为主体发展着农业文化；西部半壁河山属于干旱地区，高原耸峙，荒漠辽阔，适宜放牧，几十个兄弟民族开拓着游牧文化。东部农业文化，西部游牧文化，这两大文化组成了古代中华文明的内核。与此相对应，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一起，共同铸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过去的农业文明时代，中国东西部农、牧两大经济系统之间，既相互依存与交流，又相互独立与排拒。馈赠贡赏，茶马互市，绢马互市，是依存、交流的象征与体现。而相对的独立性、分割性，往往较为突出。而今，中华民族正告别“农业文明时代”，奋起向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进军，东西部的关系决非简单的“茶马相市”了。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智力、科技、信息资金等“软资源”，东优西劣，由东向西递减；但，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矿藏、能源、建材等“硬资源”，却东贫西丰，由西向东递减。而广大西部地区，正是数千万少数民族世代代生息繁衍、辛勤开发的地方，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他们的经济文化、教育还很落后。因此，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能不首先考虑这一基本国情，考虑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各少数民族分别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等社会母体脱胎，跨越了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历史时代，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革命的疾风暴雨，摧枯拉朽，使少数民族社区在政治体制方面实现了跨时代的历史跳跃。然而，支撑民族社区平衡的另两条腿——经济与教育，尚为“短跛”，更多地反映出跨时代历史差距，制约着民族社区总体发育水平的提高。我们从战略高度俯

瞰，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的振兴，民族现代化的推进，最核心的问题便在于提高民族人口的素质。这就正是民族教育的历史使命。

三、民族教育功能的多维思考

然而，“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八个大字的深刻内涵，远没有普遍被人们所把握，不少短视者只扫视了一下它的浅表层，依旧在“吃祖先饭、砸子孙碗”的羊肠道上蹒跚而行。笔者不能不强调，民族教育是一根杠杆，它能驱动民族社区向更高文明程度演进。民族要振兴，各民族要实现向现代化的“历史再跳跃”，根本大计就在于大力发展民族教育，不过，这个教育须当是“大教育”。

第一，发展民族教育，提高现实劳动者的素质，逐步改善现实生产力的质的结构。

广大民族地区由于河山阻隔，经济落后，社区封闭，劳动者一般从事较原始的畜牧或农耕，与现代教育几乎绝缘，文盲率甚高。在现代化进程中，只要配合民族经济开发，开展以社区适用的科学技术为中心内容的、形式多样化的成人教育，就能提高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的素质。抓住“爸爸、爷爷的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较快改善现实生产力的质的结构，收“吹糠见米”之效。民族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服务功能，也可直接发挥出来。同时，当班人首先受惠于教育，经济收入增加了，反过来就能提高发展民族教育的积极性，乐于增加对儿子、孙子的教育投入。这样，民族社区对教育的主客观需求也相应增大，而民族经济落后与民族教育落后互相钳制

的恶性循环链，也可从这个环节上启开。民族教育的“短平快”效应，最容易在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中发挥出来。

第二，发展民族教育，有效地迎接全国建设战略重点西移。

十年改革，以沿海4个经济特区、14个开放城市为重点的东部开发战略，已取得较好成效，奠定了全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建设重点的战略西移已提上日程。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我国西部开发的步子将会加快。预计90年代以沿海为主体的东部地区的工业结构，将向以电子、轻纺、冶金、精密仪器设备制造为主的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型发展；而西部地区的工业结构，将向以资料开发为主的资源密集型发展。如内蒙古的大露天煤矿和火力发电，新疆的石油、煤矿与高耗能工业，以及林牧农产品加工，青海的水力发电和钾盐化工，云南的水能资源开发（可开发量居全国第二位）和“有色金属王国”的开发；贵州“南方煤海”开发（储量居全国第4位），与水能资源开发（理论储量居全国第6位）；宁夏太西煤开发与石膏开发（储量居全国第2位），四川民族地区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三大水系的水能资源开发（理论储量全国第1位），等等，将成为战略西移的第一批开发重点，和西部开发的辐射源。随西部开发战线的拉开，将带动民族地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促进社区产业结构的变化。迎接西移，配合西移，民族教育积极培养人才和培训各种相关专业人才，大有用武之地。抓住了这个重要的结合部——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取向的战略结合部，民族教育必将释放巨大功能，开创新格局。

第三，发展民族教育，促进双向开放。

我国对外开放，先从沿海开始。随改革开放深入发展，近年来已开始采取东部沿海与西部陆疆“双向开放”的战略。我国少数民族有70%居住在陆地边疆；内蒙、新疆、云南、广西、西藏等地有不少侨民居于国外；西部民族地区有几十座边境口岸城市，与12个国家毗邻，这些都是边境口岸开放的有利条件。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北海市，是我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已成为大西南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内蒙古的二连、满州里市，新疆的伊犁，已作为二级开放城市对外开放，很快发展为西向开放，即主要对苏联、蒙古、东欧诸国开放进而向南欧、非洲延伸开放的重要“窗口”。大西南也陆续开放了一批边境口岸，如云南的瑞丽、畹町，西藏的樟木等，成为向东南亚诸国开放的重要“窗口”。伴随战略重点西移，有关方面正研究、论证着建立伊犁、喀什、克拉玛依、满州里等“西部经济特区”的方案，以及利用银川处于西北、全国甚至东亚大陆的地理中心之优势，和穆斯林宗教聚合力之优势，开辟民族地区“国际航空港”的议案。如此步步推进，势必会形成全国经济开发的对外辐射与对内辐射两个“双扇面辐射”的新格局。西部民族地区的开发，定会加速推进。这种新的态势，大大有利于打破民族教育长期在相对封闭的系统内徘徊的局面，使民族教育堂堂正正地面向世界，同时又给民族教育改革提出了新课题。近年来，世界各国为捕捉我国民族地区逐步开放的机遇，陆续派留学生来我国各民族学院和一些民族地区学校留学，学习研究我国民族经济、文化、历史、语言等，民族教育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国际性功能”。这是值得注意的发

挥民族教育功能的新编度。

第四，发展民族教育，是一种安邦大略。

我国的海岸线仅1,800多公里，可是陆地边境线却长达22,000公里。漫长的边境线，几乎全在民族地区，全国70%的少数民族居住在边疆地带，与12个国家邻境。自古以来，各兄弟民族为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巩固边疆、开发边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建国40年来，各兄弟民族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边疆而艰苦奋斗，为发展边疆政治、经济、文化而辛勤开拓，付出巨大的代价，换来了祖国的安宁、边疆的初步繁荣，其功业永远辉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辉煌史册。在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不能忽略边疆民族地区条件艰苦、交通困难、远离内地、人口分散、经济与文化教育基础还十分薄弱等客观现实，要采取一些特殊政策措施来发展边疆民族教育事业。我们应当看到，我国有33个少数民族跨境跨国而居，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各国之间的相同民族或各少数民族的友好交往逐步密切起来。倘使我们的边疆民族教育蓬勃发展，一定会直接扩大我国民族教育的国际影响，增加对跨境或跨国民族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如云南德宏州有些边疆民族学校办得较有特色，邻国跨境民族也纷纷送子弟过来入学，他们高兴地称这是“十分方便的土留学”。世界各地的瑶族组织代表团来我国瑶族地区考察，并呼吁以中国瑶文为主，创制“世界瑶文”。世界各地的苗族也组团来我国西南苗区考察，也提议创制“世界苗文”。不少侨居外国的少数民族同胞，陆续回故乡探亲考察，并捐资发展边疆民族教育事业。一些侨居国外的爱国藏胞，也愿回国兴办藏族教育事业。因此，民族教育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也

包含着一个政治问题。称发展民族教育是“安邦大略”确实有重要而丰富的涵蕴。如果将目光投向苏联，看看近年来陆续发生的“民族骚动”与“流血事件”，便不难领悟社会主义国度处理好民族问题与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的政治意义。我们要有战略胸怀，认真研究和发挥民族教育的安邦兴国之重大功能。

第五，发展民族教育，有利于中华民族有效的生存空间的拓展，生态环境的改善。

人类最主要的生存空间是地球。当今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位于地球上最大的陆地板块——欧亚大陆的东部，东临地球上最长的水域——太平洋；东西跨62个经度，约5,200公里，时差超过4小时；南北括50个纬度，约5,500公里，兼备了从赤道到寒带的各类气候区；地表高差从新疆艾丁湖与西藏珠穆朗玛峰之间突破9000米大关，居世界之冠；国土面积近1000万平方公里。这便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创造文明的广阔舞台。对于10多亿人口的大国，这一生存空间既广阔又有限。又由于过去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未协调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致使我们有限的生存空间渐渐缩小。（1）作为传统农业文明的物质基础的耕地，已由1949年的人均2.7亩锐减到1.4亩，到21世纪将再降至1亩以下。（2）作为农业经济重要补充的畜牧业经济的物质基础——草地，正在被我国12片大沙漠“蚕食”。近半个世纪里，沙漠以每年1000平方公里的速度“蚕食”着宝贵的草地（参见《光明日报》，1986年9月23日）。北方沙漠化土地已高达33.4万平方公里。曾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历史风貌扬名于世的鄂尔多斯草

原，最近25年来，正被毛乌素沙漠以每年10万公顷的速度“吞食”（见《经济参考》报，1987年2月10日）。据专家测算，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向南扩张了200多公里“势力范围”，并正在向北扩展；著名的丝绸古道和若干古国古城，已被深深吞进沙漠之腹。目前我国天然草原沙化达17万平方公里，退化达67万平方公里，碱化近3万平方公里，三项相加已占总面积的30%以上；再加鼠害、虫害又争夺去30%的草原。占国土总面积1/3的草原，已大大缩小！（3）作为自然界中物质与能量流动之枢纽、生态平衡之中心的森林，也惨遭破坏。国际森林覆盖率的“警戒线”为30%，然而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已下降到12%！全国131个林业局，已有25个无林可采，还有一些局也面临可采森林资源趋于枯竭之窘境。由于植被破坏，致使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多达150多万平方公里，黄沙每年将我国10万吨土壤冲送给太平洋！（4）作为“生命源泉”的水，也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地球拥有的水资源中，淡水只占2.7%。而人类今天能利用的淡水资源，只能占地球资源的0.0091%。我国的淡水供给，也亮了危险信号。全国有200多座城市，每天短缺淡水超过800万立方米，现代化的城市系统缺了水，大家不难想象是什么滋味。同时，全国已有35%的耕地、75%的牧区，淡水供应紧张，每年农、牧两大生产系统往往因淡水短缺而减少产出……面对种种大自然的“警告”，面对中华民族有效生存空间的缩小，我们怎能不觉醒起来，综合整治国土，通过维护和恢复生态平衡，来延展有效的生存空间。由于我国自然资源主要分布于西部民族地区，因而全国生态失衡也主要在西部民族地区。那么，整治国土、恢复生态平衡、拓展有效生存空间的综合工程的重点，也应放在西部民族地

区。不过，经济与教育不能“两张皮”，笔者上面的论述也没“走题”，文笔到此，我要强调的是，在生态失衡的环境中，教育也是失衡的；实施这一“综合工程”的时候，发展民族教育应置于重要战略位置。也就是说，要把对民族地区若干相关知识的传播、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各种相关人才的培养，与这一“综合工程”紧密结合起来。试想想，假使没有民族教育协同培养各类相关人才，提高开发者的文化科学水平，要综合整治国土、恢复生态平衡，要建立草业——畜牧业——机业协调发展的草原畜牧业生态经济系统，要建立农、林、牧、工商综合开发的经济系统，都将是沙上之塔。马克思讲得很深刻：“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创造了人。”民族地区生态失衡，呼唤着人们奋起调整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在新的生态平衡形成的过程中，与新环境协调的人，也就被造就出来。在这双向的“创造”之间，正是民族教育的用武之地。我们应从一个较深层次，来研究并启动民族教育在改造“民族社区生态系统”（指一定民族社区的人——自然环境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人类生态系统）、拓宽中华民族有效的生存空间等方面的“回天”之力。

第六，发展民族教育，加速民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谋求现代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的大潮流。实现中国现代化，乃当代中华民族的使命。中国现代化的难点，在于少数民族现代化。而少数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则在于通过发展民族教育，来启动各民族内在潜能与活力。教育是“对未来的设计”，教育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民族教育即是对民族未来的设计，亦即塑造民族未来的事业。我们现代的民族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功能系统，其内在结构可剖析为三

层：①外表层，基本功能是文化传播，即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材。这主要涉及知识层面，要求知识更新；②中间层，基本功能是文化更新，即输入现代文化意识、新的文化价值与行为模式，促使民族传统文化作合符时代潮流的扬弃与更新。这主要涉及价值层面，要求传统价值体系作合理调整。③深部层，基本功能是文化融合，即教育作为一种“高度的文化”在各民族亚文化背景中传播，促使不同类型的文化互相排斥与选择、影响与渗透、吸收与改造，进而涵化与转型，形成一种“合金文化”。这主要涉及心理层面、要求作为民族构成中最稳定的要素——民族心理调适。三个层次交互作用，便构成民族教育以文化传播——文化更新——文化融合为内涵的、并不断与社会各相关系统交换信息、物质和能量的民族文化整合的复杂运动过程。民族教育通过这种复杂的民族文化整合运动，便逐步驱动着民族社会向现代化演进。由此可得出结论，发展民族教育，不只是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事业，也是关乎整个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大业。说得通俗一点，若不优化发展民族教育，提高民族人口素质，只忙于对民族地区并非无限的自然资源作“掠夺性开发”，那么，少数民族文化将成空话，中华民族现代化也会“虚化”。

四、战略与途径

中国民族教育，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具有较多的特殊性。这是由我国少数民族的基本格局所决定的。

第一，55个少数民族，人口约8000万之众，分布在5大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5个自治县（旗），和1500多个民

族乡（1988年底统计），还有一部分散杂分布于全国各省。这就决定了民族教育的多民族性。

第二，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域总面积就达61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63.8%。由于山河阻隔，自然环境的差异，产业结构的不同，少数民族被分割在大大小小的社区。这便导致了民族教育的分散性和多社区差异性。

第三，我国少数民族分别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农奴社会等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诸形态脱胎，跨越历史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经近40年发展，有2500多万缩小了与内地的差距，但，有3000多万仍发展滞后，还有2000多万严重滞后，发展十分艰难，社会发育水平低。这就决定了民族教育的基础薄弱性和起点悬殊性。

第四，由于自然环境、传统社会环境、社区文化环境的差异，形成了民族地区多元的亚文化。它们虽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体多元的丰富性，又具有各自的特征。特别宗教文化方面，笼罩广大民族地区的有原始宗教、道教、藏传佛教、小乘佛教、伊斯兰教等几大宗教文化圈。这就形成了民族教育的文化背景多元性。

第五，我国少数民族使用80多种语言，40多种文字，有的民族几种语言、几种文字，有的民族一语多文，有的民族语言文字体系完整，典籍甚丰，有的有语无文。这直接决定了民族教育的多语多文性。

第六，我国陆地边疆基本上是少数民族居住，而33个民族跨境、跨国而居，这就使民族教育具有国际性。

第七，诸种因素制约，各项特殊性迭加，更形成了民族教育发展的艰难性。过去几度“左”的干扰，往往无视民族教育的种种特殊性，搞“一刀切”、“大一统”，把民族教

育切成“畸型”，致使投入巨大、效益甚微，劳师费时，还造成民族文化的断裂带，在一定程度上挫伤民族感情。教训十分深刻，“学费”颇为昂贵。然而，认识的飞跃，依然是巨大的收获：尽管民族教育是全国教育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我们却不能简单地搬用全国统一的教育模式，来规范民族教育！

总结近40年的经验教训，放眼民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研究和制订符合民族教育系统运转特殊规律性的发展战略，研讨战略对策与发展途径，从而指导全国民族教育优化发展。对此，笔者略抒管见，以作引玉之砖。

所谓民族教育发展战略也就是对全国民族教育在未来几十年内的发展，作整体的筹划和全局性的指导。为便于表述，可将它分解为战略思想、战略方针、战略模式、战略目标和发展途径等。

中国民族教育发展战略的战略思想为：增强社区适应性，促进民族现代化。

按照这一战略思想，传统的教育观必须更新，教育发展方向须作调整，教育发展机制要转轨，即要求民族教育通过改革，由“升学教育模式”转变为“素质教育模式”，主要为民族社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实现民族现代化这个大目标服务。由于民族社区差异大，强调增加对民族社区的适应性，才真正突出了民族教育的个性，并使民族教育这个动态系统有广阔运转的空间。

战略方针为：四教统筹建体系，发展模式多样化。

“四教统筹”，指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四个小系统统筹安排，协调发展。有些地方提出了“三教统筹”，使民族高等教育在“统筹”之外，很不

妥当。实践中也未能很好“统筹”民族高等教育。每个自治州都有部分大专院校，其服务半径基本上是本州，但，州委州政府、州教委对它往往不“统”不“筹”，习惯地让它归上一级业务主管部门统管。其实，民族高等教育是民族教育的宝塔顶部，对民族社区向更高文明层次演进具有较强的导向性。因此，强调“四教统筹”十分必要。笔者在书后的“个案研究”解剖的“湘西模式”中，就总结了湘西州“四教统筹”的经验。

“建体系”，即指建立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而体系由多层次、多格局、多形式的小系统组成。

“发展模式多样化”也是民族教育的重要发展方针，一是针对“一刀切”，一个模式，二是要求不同民族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教育，应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因地区因民族因类型制宜，树立自己的典型，创立有自己特色的教育模式。各地民族教育的多种发展模式建立起来了，中国民族教育体系便会以多构调合的形式发挥巨大能量。

发展战略模式为：扎实抓好基础教育，重点发展职业教育，优先发展师范教育，协调发展高等教育，综合开展成人教育。

基础教育是奠基工程，既为各级各类教育奠基，又为社会文明奠基。基础工程底面要宽广，同时要夯实，前者为量，后者为质，扩大数量与提高质量相结合，而以提高质量为主。故强调一个“实”字。面对基础教育的“滑坡”，这个“实”字更大有文章可作。

职业技术教育是教育转化为生产力临界点上的教育，也是民族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突破口”。教育转轨，教育结

构调整，都重点指向职业技术教育。民族教育的重心降低，往哪儿降为宜？置于何处最佳？应当指向职业技术教育。目前较多的人认为基础教育是重点，或者提基教、职教双重点，尚值得研究。民族地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起步艰难，但，前途无量，它呼唤着开拓者。

师范教育是教育的“工作母机”，应当放在“优先”位置。延边教育勃兴，就是走优先发展师范教育的路子。国外苏联民族教育的崛起，也选择了优先发展师范教育的战略。

高等教育有很强的社会发展导向性，战略地位也是重要的。它改革的重点应放在增强对民族社区发展的导向性和对民族教育系统运转的协同性上。因此，在总体战略结构模式中，我们用“协调发展”来界定它。

成人教育是大教育的重要领地，是直接提高当班人的教育，它与普通教育是培养接班人的教育对应。它是“短平快”的教育工程，应不拘一格，遍地开花。对于战略家来说，走好了成人教育这颗“子”，就能走“活”民族教育全盘棋。

战略原则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降低重心，扩大内涵；量力而行，适度超前；长短结合，突出重点。

战略目标为：优化结构，逐步转轨，争取在21世纪初叶，初步建立与我国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教育体系。

民族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十分复杂，涉及许多宏观与微观的问题。从微观论，民族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对其若干子系统进行研究，并注意各子系统之间的联系，考虑整体结构优化。从宏观而论，民族教育又是全国教育的一部分，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所以，必须打破传统封闭性模式，既

思考如何解决民族教育内部结构的问题，也应研讨如何依托社会大系统的力量与关系，协调发展。根据以上总体战略构想，下面各章拟分专题深入研讨民族教育发展诸途径。发展途径的研究，实际也就是战略研究的纵深推进。不研究好实施战略的方略，不选择好达到战略目标的途径，总体战略就成为空中楼阁。同时，发展途径研究的实践性很强，途径本身也就是从现实通向战略目标的路子。因此，研究发展途径既要有战略性的思考，又要提出战术性的策施。它是战略导向性与战术操作性的有机结合体。

第一章研讨基础教育，提出以寄宿制为骨干多种形式办学的发展方略。多种形式办学可拓宽民族教育金字塔的底面，寄宿制可保证基础教育的质量。但寄宿制不能徒有“寄宿”之形式，关键在于赋予它新的内涵，故笔者强调了要实行“养育结合”的原则，管理评估指标量化，使之出质量出效益。

第二章提出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构想，欲使之自成体系而又与普通教育互相结合与渗透，既合流又分流、既双轨并行又可互相插入，逐步向“普通教育职业化，职业教育普通化”发展。

第三章研究“工作母机”，提出常规师范教育子系统和回归师范教育子系统协调运转的民族师范教育系统结构模式。要实现系统运转从“无序”到“有序”，笔者强调突出该系统“民族性”、“师范性”和“三中心化”的三大特色。

第四章研讨民族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和改革的方略。笔者将民族高教系统分为4个子系统，侧重探讨如何发挥各子系统的结构功能，如何协调运转和协调发展诸问题。